

華嚴寺



華嚴寺

山西云岗石窟文物保管所编

文 物 出 版 社

华 严 寺

山西云岗石窟文物保管所编

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

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1980 年 12 月第一版 198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8068·828 定价：9.50 元

华 严 寺

丁 明 夷

大同是我国北方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。北魏时称平城，自道武帝在此建都起，到孝文帝南迁洛阳止，近百年间这里一直是北中国的政治、文化中心。五代时后晋天福（公元936—944年）初，石敬瑭割让燕、云十六州，大同划归辽地。辽兴宗重熙十三年（公元1044年）“改云州（即大同）为西京”（《辽史·兴宗纪》）。金代仍以大同为西京，直到元至元二十五年（公元1288年）“改西京为大同路”（《元史·地理志》），大同作为辽、金两代的陪都也有二百余年。

契丹民族最初居住在内蒙古的辽河上游，是一个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游牧部族。十世纪初建立辽王朝后，才刚刚由军事民主制进入阶级社会。北宋初年，辽一方面受到高度发展的汉文化的影响，封建化进程很快；另一方面却又保留了不少原有特点。在其全盛时，领土东临日本海，西达天山。在契丹族、汉族等各族人民辛勤劳动，互相学习，不断融合的过程中，辽代中国北方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阶段。但是辽的统治阶级为了攫取人力和财物，多年来和宋朝兵戎相见，使辽的内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。因此，辽的统治阶级加紧利用宗教来巩固其统治。由于崇奉佛教，辽圣宗以后的几代皇帝不但在北京房山县大刻佛藏石经，而且雕成木版大藏经。据记载，辽兴宗时把民户赐给寺僧，在僧人中被拜为三公、三师兼政事令的，就有二十人。道宗末年，更一岁饭僧至三十六万人，一日祝发至三千人。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和大雄宝殿，正是在辽兴宗、道宗时这种炽烈的佞佛气氛中陆续建成的。

华严寺在山西省大同市内的西南隅，坐西向东，打破了一般佛寺坐北朝南的惯例。这是辽代特有的一种佛寺建筑习尚。《五代史·契丹传》记载：“其俗随畜牧，素无屋宇。得燕人民教，乃为城郭宫室之制。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，名其邑为西楼邑，屋门皆

东向，为车帐之法”。《新五代史·四夷传附契丹传》也说：“以其居为上京，起楼其间，邑西楼；又于其东千里，起东楼；北三百里，起北楼；南木叶山，起南楼，往来射猎四楼之间。契丹好鬼而贵日，每月朔旦，东向而拜。其大会聚视国事，皆以东向为尊，四门楼屋，皆东向。”这说明，佛寺东向，是契丹族原始居住习俗、好鬼拜日信仰与佛教形式相结合的产物。

辽代佛教主要属于密教系统，是佛教中的一个支派。密教尊奉毗卢遮那佛，它是以神秘的咒术仪礼为特征，宣扬口诵真言（语密）、手结契印（身密）、心作观想（思密）三密同时相应，主张即身成佛。密教在辽代盛行，是社会上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互相交织的反映。

—

华严寺的创建年代，说法不一。有的说是“寺肇自李唐”（明成化元年《重修大华严禅寺感应碑记》），有的说是“唐尉迟敬德增修”（明万历九年《上华严寺重修碑记》），有人推测可上溯至北魏时（清初茅世膺《重修上华严寺碑记》），但都因缺乏确凿的资料，所以很难考定。根据现存实物考察，以建于辽兴宗重熙七年（公元1038年）的薄伽教藏殿的年代最早，殿内曾庋藏了辽藏佛经五百七十九帙。道宗清宁八年（公元1062年）“十二月……癸未，幸西京”（《辽史·道宗纪》），“建华严寺，奉安诸帝石像、铜像”（《辽史·地理志》）。这时的华严寺，已不仅是参禅礼拜和储存经藏的佛教道场，而且还具有辽皇室祖庙的性质。《山西通志》记载得较具体：“华严寺……有南北阁、东西廊。北阁下铜、石象数尊：中石像五，男三女二；铜像六，男四女二。内一铜人，袞冕帝王之像，余皆巾幘常服危坐，相传辽帝后像”。关于辽代华严寺的规模，除上述两座大殿外，薄伽教藏殿以北，正殿（大雄宝殿）以东，还建有一系列的殿堂、廊庑、楼阁等，它是辽境内的主要寺院之一。

辽末天祚帝保大二年（公元1122年），金兵攻陷西京，华严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金大定二年（公元1162年）《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碑记》中记述：“至保大末年，伏遇本朝大开正统。天兵一鼓，都城四陷。殿阁楼观，俄而灰之。唯斋堂、厨库、宝塔、经藏、泊守司徒大师影堂存焉”。这里所指的经藏，就是现存的薄伽教藏殿，影堂可能是解放前焚毁的海会殿。这次破坏后，直到“（金熙宗）天眷三年（公元1140年）闰六月间，则有……僧录通悟……等，乃仍其旧址，而时建九间五间之殿，又构成慈氏

观音降魔之阁，及会经、钟楼、三门、垛殿，不设期日，巍乎有成，……其费十十余万”。通悟死后，他的门人省学继续完成这一工程：“基之有缺者完其缺；地之不平者治以平。四植花木，中置栏槛。其费五百余万焉”。（大定二年碑）这时，教藏的经卷已散失大半，僧慈慧又依照辽藏目录，经历三年的勘求采访，征集遗经予以补完，“卷轴式样，新旧不殊，字号诠题，后先如一。”（大定二年碑）金代大华严寺的规模，已远逊于辽代。

金大定六年（公元1166年），“世宗如西京，幸寺观辽诸帝铜像，诏主僧谨视之。”（《金史·世宗纪》）这批铜像，元初世祖时仍在。《元史·石天麟传》记载：“江南道观偶藏宋主遗像，有僧素与道士交恶，发其事，将置之极刑。帝以问天麟，对曰：‘辽国主像在西京者，今尚有之，未闻有禁令也’。事遂寝”。元武宗至大年间（公元1308—1311年），又有僧慧明主持重修，修复大殿、方丈、厨库、堂寮，新建浴室、药局及赁住房屋数百间，并补完教藏。这是又一次的规模较大的工程。

中国封建社会，每逢一次改朝换代，就要带来一次战乱。元明之际，兵连祸结，使华严寺再次遭受严重破坏。明初洪武三年（公元1370年），一度没为官产，“改大殿为大有仓，二十四年，即教藏，置僧纲司，复立寺”。（清道光十年即公元1830年《大同县志》）这里的大殿，指大雄宝殿。教藏指薄伽教藏殿。这时均分别修治，周围增建了一批建筑物。因此，明万历九年（公元1581年）《上华严寺重修碑记》中，已明确标明“上寺”。从此，华严寺便分成了隔路相望的两组建筑，各开山门，分别进行修建。遂以大雄宝殿为中心的一组称上华严寺，以薄伽教藏殿为中心的一组称下华严寺。

清初顺治五年（公元1648年），因发生姜瓖兵变，华严寺又罹战火，造成“绀宇琳宫，鞠为茂草”。（《山西通志》）此后，曾多次修葺附属建筑。现存的上、下寺两组建筑，除薄伽教藏殿和大雄宝殿为辽、金故物外，其余都是晚近重建的，所以布局显得急促，结构也趋于纤巧。清末以来，更是百孔千疮，风雨飘摇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座古代建筑，多次进行维修、整顿。一九六一年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公布上、下华严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二

这两座具有独特风格和高度艺术水平的辽、金建筑，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薄伽为薄伽梵之略，又作婆伽婆，梵语，义译为世尊，是佛的十个名号之一；教

藏，指佛教的经典。薄伽教藏殿自辽中叶以来，就是华严寺的藏经殿。现在殿内所藏的辽代佛经虽已散佚，但藏经用的经橱（壁藏）和天宫楼阁依然存在，它和大殿以及殿内的辽代彩塑，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。

大殿东向，面阔五间（25.6米），进深四间（18.41米）。殿内内槽当心间左侧四椽枋底的题字是：“推诚竭节功臣，大同军节度，云、弘、德等州观察处置等使，荣禄大夫，检讨太尉，同政事门下平章事，使持节云州诸军事，行云州刺史，上柱国，弘农郡开国公，食邑肆仟户，食实封肆百户，杨又玄”。右侧椽底题字：“维重熙七年岁次戊寅，玖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时建”。这是该殿建造年代的确凿证据。大殿座落在高广的台基上，殿前设有月台、石级，反映了辽代佛殿东向的习俗和基台平面配列的风格。大殿正面中央三间，装隔扇门六扇，后壁正中开矩形小窗一个，其余部分都用厚墙封砌。佛殿前有辽寿昌元年（公元1095年）陀罗尼经幢一座。殿顶为九脊歇山式，坡势平缓，檐柱升起，四角翘扬。殿顶在明代曾按原有坡度加以修葺，勾滴、鸱吻是辽、金的旧制。琉璃鸱吻近似龙的形状，可能是金代故物。

薄伽教藏殿采用了我国传统的木骨与斗拱相结合的建筑手法，具有简洁、疏朗的特色，整体外观稳固、轻巧，是国内现存辽代小型殿阁式建筑的典型。殿内支柱的配列比较特殊，当心间只有两根支柱，称为“金柱”，左右次间除有前后金柱外，还有一个“分心柱”，用以承接屋顶重量。这种配列方法，在保持合理承重的同时，最大限度地扩展了建筑物内部的空间；既便于宗教礼拜活动，又节省了木料，说明九百四十年前我国民间建筑匠师就已掌握了科学的结构方法。殿内外斗拱共有八种。外檐柱头为双抄重拱计心造五铺作，式样简单、洗炼，全无繁复、支离的弊病，尺度比例与建筑本身权衡恰当。补间铺作一律一朵，栌斗未放在普拍枋上，下承蜀柱，这种形制介乎唐、宋之间，与柱头铺作并施，显得主次分明。转角铺作加了抹角拱，用以分负檐角荷重。这种做法，既非唐代遗制，又未见之于《营造法式》，类似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上层转角铺作，是辽代特有的手法。内檐斗拱共用五种，各因目的不同，而施用了不同形制。殿内中央三尊佛象顶部的天花上，各有一个“鬥八”藻井，上下各八角，这样处理，不仅可以避免因天花板与佛象背光距离较近所产生的压抑感觉，而且在结构上也显得富有变化。平基藻井以下的木结构，为典型的辽代通行的式样，而上部的梁架，是经过明代重修的。

古代建筑的权衡比例，与材枅是分不开的，这个殿经过实测，材的广（宽）、厚（高）大体与宋《营造法式》相符，而枅的广厚，较《法式》为大，这显然是受到唐制

的影响。因为，薄伽教藏殿创建年代，早于《营造法式》六十二年，当系受到唐代遗规的影响。辽的地域包括燕、云一带，唐和五代的文化对它的影响，无疑比北宋的影响要大。金代疆域扩展到淮河流域，北宋出现的许多新手法传到这里，受到黄河流域文化的强烈影响。因此，基本上可以说，辽仍唐制。

大雄宝殿是寺内的主要建筑，在辽末被毁后又于金代天眷三年（公元1140年）重建的。金大定二年碑记“至天眷三年，……乃仍其旧址，而时建九间五间之殿”和一九五三年在大殿梁上发现的“天眷三年”题记，对它的重建年代都是最好的证明。

这个大殿也是东向，面阔九间（53.75米），进深五间（29米），总面积为1559平方米，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殿之一。其建筑结构为单檐四阿顶，举折平缓，斗拱为双抄重拱五铺作。殿顶正脊高1.5米，两端鸱吻高4.5米，筒瓦长80厘米，约重27斤。脊饰垂兽作二首相联状，形式极不多见。整个大殿气势雄伟，结构坚固，历八百多年仍矗立在高广的台基上。大殿前设有月台、石级、钩阑，形成“凸”字形的平面，这是辽、金建筑中流行的平面配列。大殿前立有辽大康二年（公元1076年）八角陀罗尼石经幢。

这座大殿的结构手法和邻近的大同善化寺三圣殿、山门（金天会六年——皇统三年，公元1128—1143年）是不同的，在许多细部的处理上，手法和辽清宁二年所建的应县木塔相似，说明金天眷三年重建，应是按照辽清宁八年大殿的旧式兴修的。如果与重熙七年建的薄伽教藏殿比较，它的一些做法，如无替木而代之以撩檐枋；补间铺作栌斗下有驼峰；柱头和补间铺作除明间外一致；出现斜拱等，又说明晚于薄伽教藏殿。

殿内中央有大佛五尊，按照宗教的要求，需要一个相当宽敞的殿堂，以便于礼拜瞻仰，因而采用了“减柱法”；在中央七间大的地方共减少内槽金柱十二根，并使外槽的柱子略向里推进。这样，既减少了殿内柱子密度，又能合理承重，并节省了不少建筑材料。这对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如何运用结构力学有重要价值。

我国古代木构建筑中，四周封砌厚墙，只起隔离作用。关于斗拱的这种组合，在我国古代建筑中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不仅外观华美，而且可以分散梁柱交接处的剪力，瓦顶高耸和出檐深远，都和斗拱有直接关系；大雄宝殿檐头高达9.5米，出跳远至3.6米，没有斗拱，是难以想象的。大殿的外檐斗拱，共有五种，均为五铺作，形制硕大有力。其中当心间和两个梢次间的补间铺作，分别施用60°和45°两种斜拱，颇富变化，这是辽金建筑的独特风格和燕云一带建筑的地方特色。内檐柱头的转角铺作，采取了

“缠柱造”的方法，即在转角栌斗的正、侧两面各施附角斗，以加强斗栱之间的联系，分负檐角荷重。大殿正面有辟门三，门版外饰壶门牙子，形制古朴，其大构件似未更换，应是辽金故物。

三

两座大殿除建筑本身外，殿内保存的彩画、塑像、壁画、碑记、壁藏等，也都是十分珍贵的。

薄伽教藏殿内的平基藻井和内槽彩画，大都是辽代原物。如平基藻井和佛像背光上的网目纹，是最常见的一种辽代纹饰。背版、栌斗、散斗上的写生花、网目纹和流水形环状圆光，也是辽代的纹样。平基上的长体飞天的形象飘逸流动，宛如浮空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殿内现存的金大定二年（公元1162年）僧省学撰的《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记》和元至元十年（公元1273年）《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圆照明公和尚碑铭》，是华严寺的重要史料。殿内树立有关寺院兴建的碑记，是唐以后北方寺院的惯例。

殿内这些塑像除少数是明清补塑的以外，完整地保存了二十九尊辽代塑像。这些辽代的塑像，据金大定二年碑记说，是表现“三世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）诸佛、十方菩萨、声闻、罗汉、一切圣贤”的。殿内坛的中央并列着三尊如来佛，四角配置四个铠冑森整，面目愠恚的护法天王，这是根据佛经中东方持国天、西方广目天、南方增长天、北方多闻天的形像塑造的。佛坛作倒置的“凹”字形，这是仿照人间居室坐床的形式制作的。三佛是显教中常见的题材；中间佛的胁侍菩萨，坐昇灵座，则是密教系统常用的佛座。在三佛和护法天王间，还杂然相陈着许多弟子、菩萨和供养童子等塑像。有些虽经后代修补，但所好修补得并不太多。塑像全部赋色，面部和冠上贴金。面相是辽代佛像中常见的类型。这些菩萨，神情体态各不相同，它们或盘跏趺坐，或跪坐，或站立；有的合十、有的扬手，塑造技法娴熟如出一人之手，人们走进殿堂，恍如置身在人群之中，全无一般佛殿中那种静寂、肃穆的感觉。这些塑像，兼有唐代塑像的丰满、沉郁的特点和宋塑中富有生活气息的特色，虽说是佛、菩萨的形象，但她们是人间的“神化”。菩萨大都身姿秀美，具有娴淑的女性风度。其中有一尊塑像，刻划得相当细腻，上体微裸，合十嚬笑，婉丽动人。特别是几个不同体态、不同表情的供养童子和迦叶等，更为生动、传神，完全突破宗教造像的拘囿，赋予它们以鲜明的个性。这些造像，是辽代彩塑艺术的珍品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。

大殿内侧沿壁排列重楼式壁藏三十八间，至后窗处作天宫楼阁五间，两侧以圈桥子与左右壁藏相接。这组木雕结构，是国内仅见的规模较大、制作精巧玲珑的壁藏经橱，它对于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实有重要的科学价值。壁藏分上下两层。上层设龕，供设佛像或功德主像，在一个佛龕上额的木牌上写着：“恭闻佛尊不动，法贵转轮……”，下署“中统二年十月望日崇玄示”。下层为藏经的经橱，装扇二扉，坐于叠涩台上，中间安装华版。再上为腰檐，佛龕设在腰檐平座上，外装钩阑，上复瓦垅、脊、吻，与大型建筑物无二。壁藏的斗拱共十七种，形制繁复，和实际建筑中的斗拱结构完全相同，只有大小的差别，却没有形制上的不同。柱头斗拱为双下昂七铺作，是目前所知道的辽代斗拱中最复杂的一种，壁藏内部还保存了辽代彩画。壁藏，制作得精巧细致。钩阑的束腰华版，一律雕成各不相同的几何形镂空图案，单就这些花纹来说就有三十七种，具有多样统一的艺术效果。殿内后壁的天宫楼阁和山西晋城县二仙观（宋绍圣四年一政和七年，公元1097—1117年）的天宫楼阁、应县净土寺大殿梁枋上的金代天宫楼阁一起，构成了山西古代建筑的独有的地方特色。

辽代刊刻大藏经，据现存的文献和实物看，以薄伽教藏殿中金大定二年（公元1162年）碑记为最早。碑中记述：“尔及有辽重熙间，复加校证，遂制为五百七十九帙……。今大华严寺，从昔以来，亦有是教典矣。”辽藏又称契丹藏，系据宋藏刻印，全部用汉文，卷轴装。辽代大藏经的刻印，开始于重熙年间，最初送高丽王室以及志智和尚、南阳邓公印造的大藏经，很可能都是重熙藏。到咸雍四年，最后完成刊刻工作。咸雍八年赐高丽佛经及慧照和尚买回的佛经，可能是咸雍年间的续雕版。

因契丹书禁极严，契丹藏流传到宋、金的很少。当年刊印的辽代大藏经，经过九百多年岁月的颠簸，流传国内外的辽藏，一卷也没有保存下来。薄伽教藏度藏的这批辽代经藏，因多次散失，金代僧慈慧曾经“竭三年之力，补之教藏”（金大定二年碑），元代时“本寺教藏零落甚多，或写或补，并令周足”（元至元十年碑）。但是，这些经藏明清以后又全部散佚。薄伽教藏现度藏的是明清藏经共一万八千余册。其中明万历诸藏经一千七百册；清藏则有同治年间翻刻的《龙藏》七千余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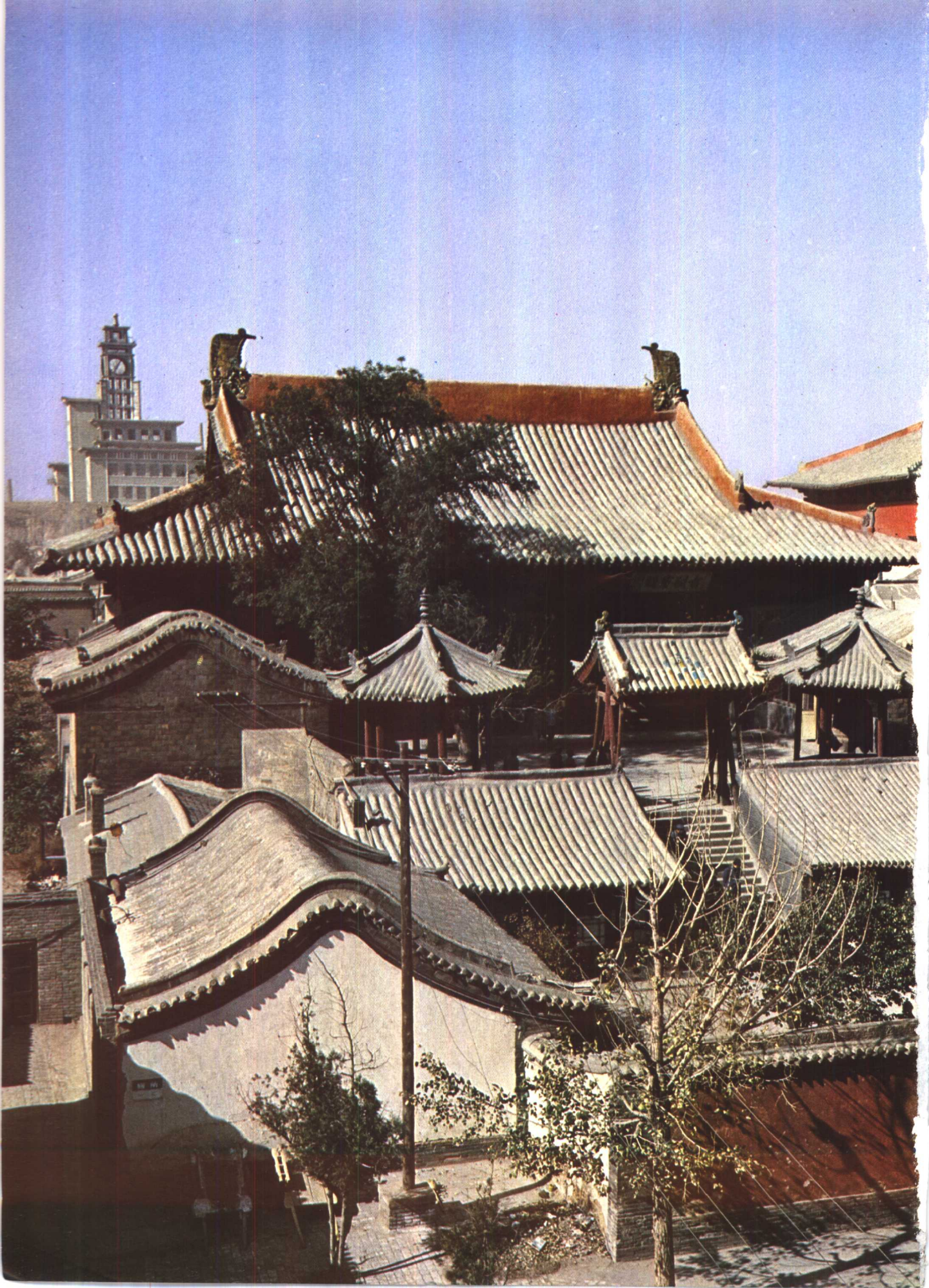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七四年以来，距大同南约六十公里的辽清宁二年（公元1056年）的应县木塔中，先后出土过几批卷装的辽代刻经和抄经。其中，有辽太平五年（公元1025年）的年号，从而弥补了中国佛经印刷、流通史上的这一页空白。这批辽代刻经，开刻地点是在燕京；写、刻俱佳，有单刻经卷和属于契丹藏系统的经卷，千字文编号用《随函录》，行十七字，卷前有扉画一毗卢遮那说法图，说明它渊源于宋开宝藏系统，也说明辽代密

教的兴盛情形。将来这批重要资料经过整理、研究和发表，将为佛教史及北方地区雕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，提供珍贵的资料。

大雄宝殿内平基和佛像，建于明宣德—景泰间（公元1426—1456年）。明成化元年（公元1465年）《重修大华严禅寺感应碑记》中记述：“迨我圣朝宣德间……造金像三尊，由京师遥请于此……，安毗卢三像……化缘塑像二尊，共裱为五如来。及构天花栴枰，彩绘檐栱，灿然大备”。明初改为大有仓后，将原有佛像搬掉，至明中叶又将佛像恢复重装的。中央为五方佛：中间为毗卢遮那佛，东方阿閼佛，南方宝生佛，西方阿弥陀佛，北方不空成就（或微妙声）佛，这是密教中常用的形象。大雄宝殿中的佛像是喇嘛教的形象：面相扁平上宽，肉髻上现宝珠，佛座为长圆抹角的仰莲座，主佛背光装饰复杂，有金翅鸟。两旁为胁侍菩萨，南北立两排二十护法诸天王。殿内四壁满布巨幅壁画，高6.4米，总长136.8米，总面积875.5米²，清末光绪年间绘制，规模之大和壁画的许多题材，都颇为罕见。根据壁画构图和某些细部来考察，其粉本的来源，至少有一部分（如西壁北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）应在明代以前。壁画内容，除山墙部分互有联系外其它已较零散。东壁北部为佛传故事，是依明代原物重绘的；南部为观经变和华严经变。西壁北部所绘的善财童子拜观音，是宋代流行的题材，南部所绘单个善财童子，这样的题材可能要溯自晚唐。

华严寺，是历史的产物，文物的精英，它对于我们了解契丹民族的文化、民族间的关系，研究古代建筑、造象和佛教的历史，都是可贵的资料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。





— 华严寺全景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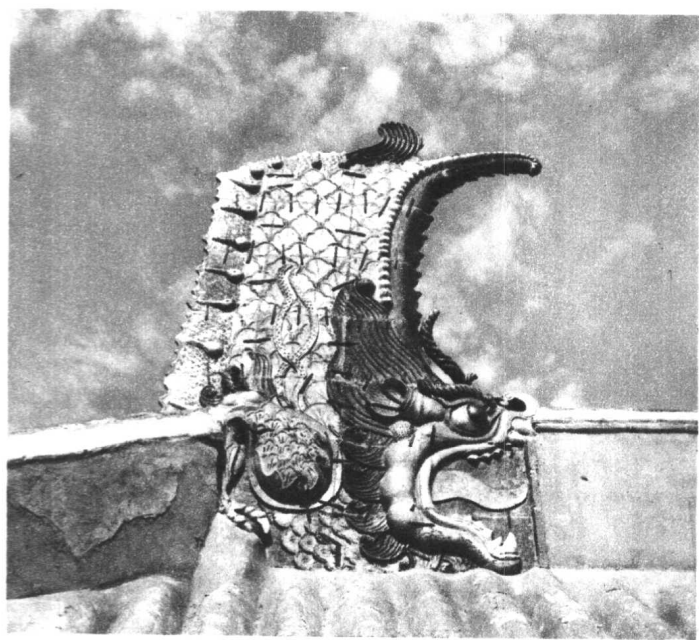
二 上寺外景

三 上寺山门





四 上寺大雄宝殿前的月台



五
大雄宝殿屋顶鸱吻